

梅兰芳(1894~1961),京剧大师,世称“梅派”,代表戏京剧有《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昆曲有《思凡》、《游园惊梦》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兰芳先生多次来青岛,或演戏或休养度假,雁过留声,在青岛城市文化史上书写了浓浓的一笔。



1936年,梅兰芳先生的青岛之旅

□曲海波

1927年2月,当时的京剧“三大贤”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以及名伶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高庆奎、筱翠花、程继先、王又辰等,应军阀张宗昌之约,为其父祝寿,特来山东演戏。名伶们在济南演出结束后,全班人马又来到张宗昌的原籍掖县(今莱州市)祝家村设戏台三处,演出三天,以为之光宗耀祖。

青岛巨商、金融家刘子山因与张宗昌是掖县同乡,趁机邀请这些名伶来青岛,到他于1924年兴建、位于平度路22号的新舞台大戏院(后称永安大戏院)演戏,为新舞台大戏院聚集人气,大做广告。于是,梅兰芳这些京剧名伶又从掖县转道青岛,在青岛连演三天大戏,剧目有《天女散花》《玉堂春》《定军山》等,演出受到了岛城广大戏迷们的热情欢迎,场场爆满,让观众们过足了戏瘾。这是当时京剧名伶在青岛的一次空前的盛会,也是梅兰芳首次来青岛。

上世纪30年代,青岛作为避暑城市在全国已闻名遐迩。1936年8月5日,梅兰芳先生偕夫人福芝芳乘坐当时中国航空公司的客机由上海飞来青岛避暑,初暂住于莱芜二路一位陈姓朋友寓所,后下榻于汇泉路7号的著名饭店东海饭店。

东海饭店建于1934年,由美商滋美洋行投资,钢筋混凝土结构,主楼7层,是当时青岛



梅兰芳夫妇来青下飞机后在机场留影。

乃至山东的最高建筑,整体呈扇形,每一个房间都可以看到海,有餐厅、舞厅、咖啡厅,88套客房均有阳台,七楼平台为露天电影厅、露天咖啡座。

梅兰芳先生此次来青避暑的消息通过报纸媒体报道后,很快引起青岛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尤其是广大市民戏迷朋友,都期盼能一睹梅先生的容貌和舞台风采,现场亲身感受梅派京剧艺术的魅力。在青期间,梅先生和夫人除了到前海栈桥、崂山等青岛著名风景点游览外,日无暇晷,受邀出席各种欢迎宴会、座谈,接受青岛社会各界人士来访等社会应酬。

1936年8月4日至8日,第二届全国慈善大会(中国著名慈善组织)在青岛召开。我国杰出的爱国人士、慈善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世界红万字会中



报纸报道梅先生为慈幼会筹措经费义演的消息。

【走南闯北山东人】

李学为:参与日本花冈暴动的夏津人

□周冰

1945年3月26日,李学为到临清县去赶集,刚走到半路,就被日伪军截住,关进了监狱。4月18日,青岛外滩黄海海面,日本武装货轮“衡阳丸”号停在6号码头的海面上,一行近600名华工每人发了一套黑绿色的衣服、一块线毯、一顶帽子,在军警的棍棒驱使下,伴随着一片哭声登上甲板,走上了悲惨的劳工之路。

“衡阳丸”号在海上颠簸了十几天后,才于5月2日停泊在日本下关码头。第二天上午,全体华工被推上了驶向东北方向的闷罐列车。经过三昼夜长途奔波,列车嘶叫着推开了地狱之门——秋田县花冈町(现大馆市)作业所。

1945年5月,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盟军逼近并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国内进入物资极度匮乏时期。李学为一行近600人到达花冈时,正赶上河川改道工程进入所谓的“突贯期”(即无限期的突击干活),每天劳工们顶着星星去上工,晚上顶着星星收工,干活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一天两顿色如红胶泥的橡子面窝头,一顿只有一个小,晚上是一碗橡子面糊糊。饿死累死的劳工一天一天在增加,开始还一尸一箱拉出去火化,后来就攒到三五个一块拉,最后火化已经来不及,不少就给埋到山坡上了事,到花冈一个多月时间,经李学为本人背出埋到山坡上的就有7人。

1945年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被俘八路军战士薛同道因饥饿难忍悄悄到附近韩国侨民家要了点剩饭吃,被日本监工发现抓回。监工们先是轮流用木棍、皮鞭毒打他,后竟用烧红



李学为的劳工赔偿金汇款凭证。

在夏津县郑保屯镇已故村民李学为的家中,存放着一张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中国银行汇票,项目记载为:“劳工赔偿金(李学为)”,金额“25万日元”,收款人“李传芹(李学为之子)”。这笔特殊的款项,是日本鹿岛建设公司根据2000年11月2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花冈事件诉讼调解书”,向中国986名受难劳工支付的5亿日元中的一部分。



李学为家里收藏的纪念花冈暴动60周年纪念牌。

的烙铁烙他的脚板筋,20多岁的小伙子最终被活活折磨而死。薛同道事件成为点燃六卅花冈暴动的导火索,大队长耿谭(河南省襄城人)召集中小队长骨干共13人开会并秘密组织、串连、策划举行暴动:杀死日本监工,报仇雪耻;冲出地狱,回到祖国去抗日。这些内容在劳工中秘密传播,大家个个情绪激昂,决心豁上一死,大干一场。

6月30日晚11时,李学为在病房隐约听见一阵骚乱,跑出房门,昏黄的灯影里看见平

国总会会长熊希龄先生担任大会副主席。由于大会主席孔祥熙因故没有到会,这一届慈幼大会由熊希龄先生主持。

梅先生此次和夫人来青,纯为避暑,在青岛居住20余天,本无登台唱戏的打算,但是在市民戏迷们的强烈请求下,适时又承蒙来青出席主持慈幼大会和避暑的熊希龄先生热情邀请,盛情难却,梅先生便应允,计划在8月25日至27日,为慈幼大会筹措经费在大舞台戏院义演三天,票价10元、5元、3元。

因当时梅先生和夫人只是两人来青,并没有带戏班。确定义演后,梅先生就忙碌起来,紧急联系在北平的相关配角来青配戏,终因时间匆忙,所邀配角都各有戏约在身,不好安排时间,演出只得取消。

1936年8月24日,梅先生和夫人乘中国航空公司成都号客机离青赴上海。当时记者在机场采访梅先生时间:“各界人士很渴望聆听梅先生的雅奏,何时能再来青岛?”梅先生答曰:“以后有机会,或能再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8月,梅兰芳先生故地重游,亲率艺术实力非常强大的梅兰芳剧团来到青岛永安大戏院演出,时间长达近一个月,使青岛的广大戏迷观众能够充分领略感受梅派艺术的魅力,这也是他在青岛的绝唱。因为梅兰芳先生此后再也没有机会来过青岛,1961年8月8日在北京病逝。

【民间记忆】

战三秋

□孙清鼎

1971年“林彪事件”过后,“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越喊越响。为响应上级号召,农村每逢“三夏”、“三秋”农忙时节,从公社到大队都做出拼命大干的作战架势,把农具看作刀枪,把田间当作战场,把收割、耕种之物视为敌人,谓之“战三夏”、“战三秋”,而且是“大战”,还要“战犹酣”。

临“战”状态自然不同于平常,各级都成立生产指挥部,召开誓师大会,做战前动员。“战役”打响后,每天各小队的生产进度数字都要统计后报到大队指挥部,然后汇总逐级上报管区、公社。大队和各小队的“学习栏”、“批判栏”、“表扬栏”、“光荣榜”(所谓“三栏一榜”)都由大队宣传组主办、张贴,要办到田间地头;彩旗、标语、广播喇叭,凡能利用的宣传工具全部启动,借以大造革命声势。

“三秋”指挥部就设在田间。秋收旷野,距离很远的人都能看得见指挥部上插的红旗,宣传人员在指挥部办公,棚内挂有每天更新的生产进度表,棚外用杉木设置一个高高的流动红旗架,各生产小队以三角红旗表示,按一二三四为序排开,每天以各自的生产进度用绳子拉拽升降。

学校在“三夏”、“三秋”时放农忙假,村里学校的教师便是大队指挥部宣传组的成员,能写的写,能画的画,不能写画的提糨子桶张贴,或到各生产队收集典型事迹材料、生产统计数据。我因为在学校读书时经常办黑板报,从初中开始,每逢“三夏”、“三秋”就被我们大队的老师抽到宣传组帮着抄抄写写。

记得1975年秋天,“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喊得更响,因此“战三秋”的声势比往年更大,街头墙上、路边树上,到处都是“革命不拼命,要命有啥用”、“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扒一层皮,掉十斤肉,鼓足干劲争上游”、“谁英雄,谁好汉,三秋战场比比看”之类的标语口号。天不明,公社广播站就利用有线广播播放起床军号声,军号一过,大队负责人便通过广播喇叭喊叫起床,村民们在喇叭头子里的表扬、批评声中出工下地。那时候农业机械还很稀少,运送庄稼、土杂肥全靠人力地排车,耕地把地大都使牛,有时牲口实在忙不过来,为了赶进度就用人工上,喊着号子人拉犁子、人拉耙。最忙活的那十几天,出工收工两头不见太阳,午饭也要在田间吃,村民自带饭菜,生产队免费供应茶水或稀饭。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繁重体力劳动,把有些人累得摇摇晃晃,身子骨如同散架一般,稍作休息时不问是呵拉地还是乱草窝倒头就睡,如此强体力劳动,休息时还要组织学习,一人读报纸众人听,叫做“田间政治学习”,歇人不歇脑,人放松政治思想不能松。

夜晚加班更是寻常之事,时称“挑灯夜战”。有一次天上飘着毛毛细雨,下午管区通知要检查夜战,各生产队按大队要求把电灯扯到路边地头,把夜晚雨中能干的翻犁肥池、挖排水沟等粗活留下来,以应付检查。夜战开始,男女老少一片沸腾,有激情的莽汉看见检查人员将到,干脆脱掉湿漉漉的褂子光着脊梁,吭吭哧哧地挥锄扬锨。我们搞宣传的人也是忙得如走马灯似的,有人现场收集最新生产消息,有人立马写稿,有人在广播喇叭上作纪实报道。记得有位老师采写了一篇他们生产队夜战的广播稿,情绪激动,亲自播报,题目是《老贫农张金铮带病抡起大镢头》。

几年后才知道,“战三夏”“战三秋”,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原来正如“文革”之初号召“造反有理”一样,是落实“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实行革命、生产两不误。革命的年代,各行各业各件事情无不显示出一股子火气的革命特色,农村收种庄稼岂能例外?这一年的“三秋”之后,济宁地区在邹滕交界处洪山口搞“邹西会战”建造“大寨田”,我被管区安排到连部做“政工”,治山扒河也有革命说法,叫做“战山河”。

时为监工做使役的20岁河北劳工孟连琪将手一挥,一大群难友便像箭一样跃进了门里,继而传来了监工杀猪般的号叫声和“咔嚓咔嚓”的肉搏声。

这次暴动,打死徐森昌治、长崎辰藏、猪股清和小林4个日本监工,由于外围把守不严,作恶多端的监工清水和福田逃跑了。大家只得沿着崎岖山路向狮子山山上撤退,李学为因久病,身体状况极差,和一些病号最终落在了后面。凌晨,他们看见山坡上忽隐忽现许多小亮点,知道是日本人在搜山,赶紧一路向上爬,黎明时分爬上了山顶,与已在那里的几十名难友聚在了一起。天蒙蒙亮,整个大山已被上千名日本在乡军人和警察包围。难友们用石块和锹、镐等与敌人展开了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捕下山。

天亮以后下起了大雨,山下共乐馆前大操场上用铁丝麻绳已围上了半人高刺了眼的木栅杆,各路抓回的劳工被陆续押到,耿谭等12名组织者被戴上脚镣手铐,关进花冈警察署,受尽酷刑。其他劳工身子不准歪斜,直挺挺被强迫跪在操场的泥水里反省,三天三夜不准吃饭。

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旗杆升起中国国旗时,全体劳工流出了激动欣喜的眼泪,大家又唱又跳,有人还扭起了秧歌。不久,一个北京籍姓王的盟军翻译官来到工房,告诉李学为养好身体等待回家。11月24日,531名被强掳来的中国劳工幸存者及400余个装着同胞亡灵的骨灰盒,一起从花冈登上了插满中国国旗和白幡的火车,踏上了回国的路程……